

《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纳萨尔巴里道路：实践与成就》

阿吉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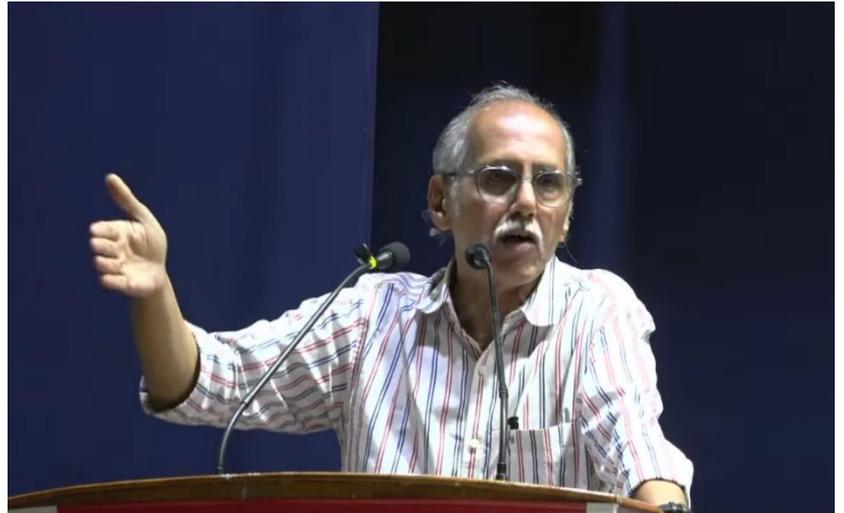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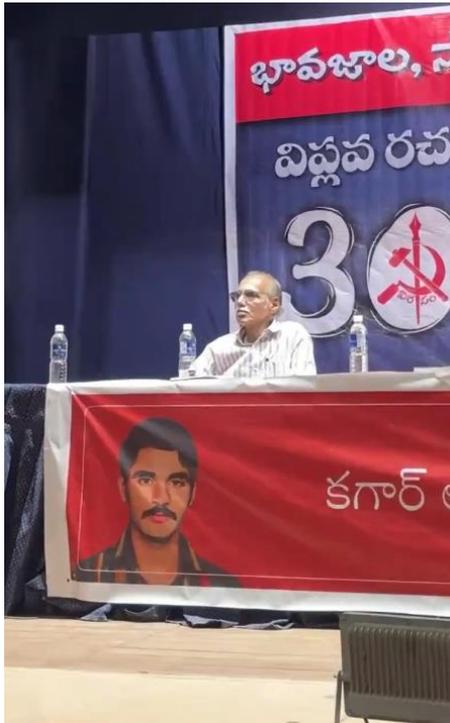
2026. 1. 24

Telegram 人民战争-中文广播频道 (@PeoplesWar_zh) 译

在反革命的“卡加尔行动”背景下，革命运动乃至整个社会在多个层面被围困的这一悲剧性时刻中，印度革命作家协会 (Virasam) 决定以“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为主题，于 2026 年 1 月 24 日-25 日在海得拉巴召开第 30 届大会，来自印度七个邦/地区的革命进步人士代表汇集于此。

来自喀拉拉邦的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吉特同志 (Ajith) 于 1 月 24 日大会召开首日进行发言，以《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纳萨尔巴里道路：实践与成就》为演讲主题。本频道对阿吉特同志的演讲内容进行了翻译，汇总成这份文件，供同志们参考。

注：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吉特同志 (Ajith, 原名 K. Muralidharan), 曾任“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组织 (RIM) 的编辑，也是印度共产党[(马列)纳萨尔巴里派]的总书记，2014 年纳萨尔巴里派与印共(毛)完成合并后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吉特同志在 2015 年被马哈拉施特拉邦警方逮捕，后于 2020 年保释出狱。



阿吉特同志在会议大厅发表演讲

演讲内容：

同志们，我被要求演讲的主题是“纳萨尔巴里道路 (Naxalbari)”，正如其英文标题所表述的——“实验与成就”。我想这里的“实验”可以理解为“实践”。

因此，恰当地说，我们应该从纳萨尔巴里究竟是什么谈起。纳萨尔巴里的特别之处是什么？我认为，最恰当的概括是，在印度，有意识地运用马列毛主义，并且清醒地认识到：**任何革命的中心问题，都是夺取政权**。正是基于这种非常清晰的理解，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武装起义爆发了。

我们知道，1967年起义发生时，西孟加拉邦由一个联合政府执政，其中包括印共（马）[CPM]、印共[CPI]、革命社会主义党[RSP]、印度社会主义团结中心

[SUCI] 等，由孟加拉国大党 (Bangla Congress) 领导。当这场起义爆发时，政府派出了时任土地税收部长兼农民协会 (Kisan Sabha) 领导人 哈里·克里希纳·科纳尔 (Hare Krishna Konar) 前往纳萨尔巴里，与革命农民进行谈判。

他提出的条件是：

“政府会把你们夺取的所有土地的地契发给你们，但你们必须放下武器。这是唯一的要求。”

据报道，农民方面的回应是：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地契。我们将夺取政权，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土地。”

当然，这种清晰的认识，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有，而是农民中的觉悟分子：源于查鲁·马宗达同志 (Charu Mazumdar) 和全国无数同志在印共 (马) 内部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因此，从一开始，斗争的焦点就放在了夺取政治权力上，其他一切问题都从属于这一根本任务。

我们知道，在斗争过程中，经历了起伏、挫折、错误等等。最终，在我国，这一目标以如下形式得以实现：

丹达卡兰亚地区 (Dandakaranya) 的“人民政府” (Jantana Sarkar)，以及比哈尔—贾坎德地区的“革命农民委员会” (Krantikari Kisan Samitis)。

我记得，在印度共产党 (毛主义) 成立之后，这些组织后来改名为革命委员会 (RPC)。这是我国第一次通过高度自觉的努力，人民能够在地方层面夺取并建

立了自己的政权。在此之前也曾发生过类似情况，比如特伦甘纳运动 (Telangana)、绍拉普尔公社 (Sholapur)，以及在艾哈迈达巴德 (Ahmedabad) 也曾短暂出现过类似局面，但那些并不是自觉尝试的结果，而是在斗争中偶然出现的。

当然，那也是有价值的，不能因此就贬低它，但我们必须在这里作出明确区分。人民政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出现，是在清楚理解革命中心问题的前提下，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建立起来的。而这种对革命核心问题的把握，正是来源于对马列主义的正确理解。

必须非常强调的一点是，这一切是通过革命实践产生的。因为现在你会看到像“红星派” (Red Star) 这样的修正主义者，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些内容，当然是在进行攻击，他们声称印共 (毛) 当前所遭受的挫折，是由于其“军事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等原因造成的。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位领导人在那篇文章里写道：“从一开始，在革命前的时期，我们就应该把建立地方人民政权的任务结合进我们的活动之中。”那么问题来了，你究竟要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如果你真的是在谈论政治权力、谈论建立地方政权，那么这里已经存在着一个既有的政权。你认为那个政权会允许你在这里建立你自己的政权吗？这就直接引出了武装斗争的问题。要记住，这些人正在攻击印共 (毛) 的“军事主义”。他们甚至在 Instagram 或 Facebook 之类的平台上发布了一张折断的步枪图片，用来象征“军事主义已经被击败”。可正是这些人，又在谈论所谓“从一开始就结合建立地方政权”的问题。

注：红星派（Red Star），全称印度共产党（马列）红星（CPI-ML Red Star）

我要说的是，人民政府（Jantana）以及类似的事物，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产物。它们是通过艰苦奋斗，通过烈士们的鲜血、人民的苦难、反反复复的斗争与挫折换来的。最终，至少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区，他们成功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宪法、规章制度，并且这些制度至少持续了几十年。当然，现在他们正面临挫折。他们很可能会失去之前所建立的一切。但革命就是这样进行的。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革命，就会发现，他们也曾多次失去过大片解放区，例如延安等地区。所以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失去了它，这在持久人民战争中是会发生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能够建立地方人民政权，这并不是靠空想，而是靠艰苦的革命实践。这清楚地表明，这条道路是从纳萨尔巴里道路中成长起来的。在今天，当我们面对像索努（Sonu）、鲁佩什（Rupesh）之类的人攻击这一点，并说我们“抵制选举是错误的”、“做这做那都是错误”的时候，这一点必须铭记。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不打算详细讨论人民政府的具体情况，因为你们可能已经比较了解了。我相信，关于这一点，有一本由帕尼（Pani）用泰卢固语写的非常好的书，也已经有多本英文著作出版，对此作了一定程度的介绍，因此，我不再赘述。但在当前革命运动遭遇挫折的背景下，与人民政府相关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我们重新思考。

我想从一个简要的方面谈起，目前敌人正通过他们的媒体、报纸进行宣传，声称这是从党的“政治局”（PB）的一份通告中摘录的，其中提到人民政府中的成员阶级性质发生了变化。我还没有看到关于此事的详细解释。当然，也不能说那是真实的文件，但这仍然很重要，它究竟表明了什么？

我认为应该结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来审视这个问题。

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当时针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斗争，后来又针对林彪进行斗争。如果我们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进程，就会发现在初期，有大量文章猛烈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基本上是在说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是坏的，其中一些人与日本人或国民党勾结等等。但在后期，尤其是在反林彪路线的斗争开展之后，出现了一些非常有深度的意识形态分析文章，试图理解这种转变背后的思想逻辑和内在原因。比如，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像邓小平这样的人，在反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时期，曾是革命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曾是红军的重要将领，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在革命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这些曾经伟大的革命者后来变成了走资派？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我想读一篇文章中的内容，这篇文章试图解释这个问题。文章内容是这样的：

“他们（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党的最低纲领——即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时，他们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而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此外，这种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并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得到改造。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时，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跟上革命前进的步伐。相反，虽然他们在物质上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决定了他们必然会同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冲突，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这段话出自一篇题为《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章 (From Bourgeois Democrats to Capitalist Roaders)。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提供了参考文献。顺便提一下，那篇文章发表在《真理》(Anutara) 一月刊上，我的个人网站上也有。

所以，关键点在于：革命在不断前进，但革命领导者的思想却没有同步前进。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然停留在较为落后的阶段，尤其是因为这是一个民主革命的阶段。在民主革命中，那些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具有爱国情怀的人，他们即便没有真正采取无产阶级立场，也可以成为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同样可以成为革命者，甚至愿意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带着那种旧世界观，它就是一种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具有进步性的，因此他们可以成为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他们不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改造，那么当革命推进

到社会主义阶段时，他们就会跟不上前进的步伐，开始与之分离，进而反对它，最终转变为走资派。因此，这种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这一现象的更深层次理解。不能简单地说“这人从一开始就是特务”或者“那人是特务所以才做这些事”，他们可能在后期与敌人勾结后成为特务，但实际上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因为没有进行思想改造。

现在，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来看。如我之前所说，纳萨尔巴里道路的关键点在于夺取政权。但问题是：夺取政权是为了什么？

这种政治权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仅仅是为了解决人们居住地周围的一些问题吗？

只是为了终结我们国家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问题吗？

它是否关系到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性的理解，即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关系到整个世界的改造，关系到全人类的解放，而这正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核心。

所以，你可以对政权有不同层次的理解：

夺取政权，可以被这样理解：这里有一个地主，把他们消灭掉，夺取土地，然后建立我们的统治，这是一种理解。

你也可以在国家层面来理解：我们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是另一种理解。

对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理解，即无产阶级的观点，要求你从世界革命、共产主义革命、解放旧社会的高度来理解夺权，进而推进到一个我们能够超越国家权力本身、拥有一个无阶级社会的阶段，在那里国家变得不再必要并自行消亡。那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们回顾自身关于人民政府（Jantana Sarkar）、农民委员会（Kisan Committees）、革命委员会（RPC）等方面的经验，以及那个“人民政府中的成员阶级性质发生变化”的说法——这种阶级性质的变化究竟是什么？我们并没有掌握具体细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推测。显然，这不可能是指私人占有财产、凌驾于群众之上这样的变化。在有党存在、有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存在、有人民民兵存在的这些地区，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夺取由人民政府掌握的集体财产，然后宣布“这是我的私产”，情况不会是那样。

但如果像我之前所说的，孤立地理解这个口号，如果政权问题仅从局部地区的角度去理解，那么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呢？

我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指出：

当地方政权能够以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行使时，“夺取对水、森林和土地的控制权”的号召，在争取这种政治权力的斗争中，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让我们考虑一下，当政治权力可以在地方层面以相对稳定的方式运行时，它所产生的影响。夺取“水、森林、土地”控制权的号召，在争取实现该权力的斗争中曾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如果它是以绝对的方式被孤立地理解，与在全国进行革命任务、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任务分离开来，那么这个口号就会起负面作用。那个原本曾经帮助或动员群众的口号，反而会转化为它的对立面。这样一来，你就不会再看到继续向前推进的必要性。你会对斗争采取保守的态度，你会考虑如何去保护现有的成果，甚至在必要时进行妥协。

所以，这种阶级性质的变化肯定会对人民战争（Peoples War）的可能发展起负面作用。这是否能够解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规模投降现象呢？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两个人投降，而是整批整群的人在投降。那么，这是否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即未能将他们的思想认识提高到一个水平，让他们看到这还不是终点，我们必须走得更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所说的这些问题，引出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与纳萨尔巴里有关，我稍后会谈。那就是：**物质现实中发生的变化在意识形态上有什么反映？**

例如，在夺取政权的早期阶段，你处于没有权力的境地。你被剥削、被各种剥削者（国家、地主、部落酋长）压迫。而现在你推翻了他们，开始行使权力。那么这种新的物质条件，在意识形态上会产生怎样的反映？如何理解这一点？这如何在你的意识形态中反映出来？显然，这会产生双重性和互相对立的影响。一方面，对革命的必要性会更加清楚；但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某种维持现状的思想，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需要保护这些成果，现在就应该在此基础上建设它，而没有把它放在更广阔的革命背景中去理解。

这又可以联系到另一个问题，这在印共（毛）的一些文件中有反映，关于阶级斗争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在那些发生了激烈反封建斗争的地方，地主不得不退缩，土地被夺取，有些地方土地被分掉了，所有这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自然带来了一些阶级关系的重组，这是一方面；但这些变化的意识形态影响是什么？因为这给革命力量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你如何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处理这个问题？一方面你必须处理新的现实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个现实基础对你自己的队伍、你自己的领导层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那么，这应当如何被理解？应当如何在思想上加以反思？又应当如何把它作为一个问题、一个挑战来对待，从而不断改造、并持续改造我们的意识形态，以应对这一新局面并继续前进？正如我所说的，这与纳萨尔巴里有关。因为正如我早先提到的，纳萨尔巴里的显著特征是自觉地运用马列毛主义。正是得益于 60 年代的中苏论战，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毛主义的真正把握，才帮助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内部的革命者，把他们的反抗斗争提高到一个与修正主义和中间派主义彻底决裂的水平。

必须牢记这一点，因为印共（马）起初并不是一个公开的修正主义政党。在早期阶段，例如在喀拉拉邦，他们在从印度共产党分裂出来之后，开始出版一本名为《思考》（Chintha）的杂志；在泰米尔纳德邦，有《红旗》（Sengodi）。在这两份杂志以及可能在全国其他地区发行的刊物中，你会看到从《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翻译过来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比如《五一六通知》这一类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在那些期刊上。印共（马）的领导层声称他们与中国

共产党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实际上，他们却在与苏联共产党、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勾结，同时也在与印度政府接触，看如何能将基层群众的革命热情引向安全的议会道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表里不一。

因此，印共（马）内部的革命者所面临的任務，并不仅仅是批判修正主义。他们还必须识别出中间派主义作为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查鲁·马宗达正确的指出：中间派主义是通向修正主义的垫脚石。正是通过大论战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领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尖锐化。才使得这些革命者，查鲁·马宗达 (Charu Mazumdar)、卡努·桑亚尔 (Kanu Sanyal) 以及所有其他同志能够与印共（马）决裂，以此表明“不，这样行不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同志与像纳吉·雷迪 (Nagi Reddy) 那样的人之间的区别，后者仍然主张应该在印共（马）内部进行斗争，去改造和纠正他们，而我们都知悉这些人最终的结局。

因此，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尖锐性，在同印共（马）的修正主义决裂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在指导纳萨尔巴里革命的理论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于未来的发展也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正是我试图强调的意识形态立场。当我们回顾当前正在经历的这些挫折时，这些问题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然，个人的懦弱、疲惫、对安逸生活的向往无疑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并不是全部。除此之外，整件事还有一个意识形态层面。我们必须把握的正是这一意识形态层面，特别是在我们面临严重挫折的时期。

同样，仅仅满足于重复那些必要且正确的立场是不够的。例如，印度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但是，今天的反封建斗争在实践中确切意味着什么？

这是必须通过观察当今社会中半封建主义表现出的具体特征，来具体解决的问题。因为有些地区，旧式的地主今天已经不存在了，由于阶级斗争的压力或其他原因，他们要么被推翻了，要么自己撤退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半封建主义已经终结。那么，当下仍然存在的半封建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通过具体分析去深入探究和理解的问题。只有当我们真正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所提出的这些立场，才会在重新推动运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实际意义。因此，这些问题再次要求我们深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此外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必须掌握许多技术性的事务。例如，这里再次提到的“卡加尔行动 (Kagar)”。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的同志们正面临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局势。你知道，那里的人民战争曾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事实上，在某个阶段一度高于我们国家的水平。而现在他们报告说，他们控制的区域和活动范围出现了收缩。他们将队伍和领导层中的保守主义视为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了敌人战略和战术的变化，在那边，空中轰炸已是家常便饭。这不像我们在印度看到的只是偶尔发生的事情。他们指出整片整片的区域是如何被大量的敌军包围的，而且战役持续时间很长。举个例子，他们提到了一场持续了近两年的军事围剿。

例如，我们知道在“卡雷古塔事件”（Karregutta）中，从我们后来收集到的报告来看，同志们原本预期那件事最多只会持续几天，但它却持续了将近两个月，这使得他们很难坚持下去。因此，这种战术的变化显然与帝国主义有某种联系。因为你在菲律宾看得到，在这里也看得到。这肯定是受美帝国主义或类似的势力指导的，所以这是我们正面临的新情况。

注：卡雷古塔事件是发生在 2025 年 4 月 21 日的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恰蒂斯加尔邦政府调集上万名安全部队士兵，对比贾布尔县-特伦甘纳邦（Bijapur - Telangana）交界处的卡雷古塔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

还有一个方面，例如城市化问题。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认为已经实现了城市化，认为现在城市问题已成为核心，农村问题不再重要，这种说法完全是胡扯。因为我国并没有发生那种我们所理解的城市化，即城市和工人阶级人口的大规模增长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农村地区。这种影响最早是通过有线电视开始的，现在则通过智能手机的普及而传播。因此，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现在的网络购物更是让其变得更加普遍。所以，这确实带来了一种非常堕落的文化，一种买办新殖民主义文化正在入侵，并与封建主义相互交织、相互强化。有趣的是，最近有一项研究表面，指出人工智能（AI）是如何强化并再生产种姓思维的。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揭露。举个例子来说，当有人向聊天机器人提问，比如“怎么称呼一个有资格从事这种高级工作的人？”系统很快就会给出一个名字，接着询问姓氏，给出的姓氏立刻就变成了“潘迪特（Pandit）”“蒂瓦里（Tiwari）”[高种姓姓氏]之类的。这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只有婆罗门或高种姓的

人才适合那种工作。这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给你的回复。所以，种姓制度在所有这些现代技术中被再生产的方式非常明显，这也将影响很多人。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方面，智能手机当然是一种通讯手段，但除此之外，它还将整个世界带到了我国最偏远的角落。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通过 Facebook 之类的平台传到了那里，而这一切是通过算法机制在运作的。所以，如果有人碰巧看到一段发生在美国的某种斗争视频，他点击并观看了一段时间，那么无论他喜不喜欢，类似的内容都会定期出现在他的推送里。

世界实际上被带到了我们国家最偏远的角落，这正在激活并拓宽政治领域（原文/译者注：偏远地区的人通过手机看到世界各地的斗争，从而产生了新的政治意识）。因此，由于所有这些现代技术的发展，现在的政治领域相当活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也为革命者提供了进行政治干预的机会，不仅仅是通过武装斗争或群众斗争，还可以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对政治事态做出反应，这在以前是不存在的，我们绝对必须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或许值得作为一个“新实验”，以推动革命道路向前发展。

所以，无论如何，最后我想再次强调这一点，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尖锐化我们的意识形态，加深我们的意识形态掌握，将意识形态的分析思维应用于我们正面临的挫折，这在今天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强调路线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纳萨尔巴里道路，否则我们将无法渡过当前的难关。

我就讲到，谢谢。